

国学经典导读

墨子

水渭松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国学经典导读

墨子

水渭松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墨子 / 水渭松著.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1.1

(国学经典导读)

ISBN 978-7-5078-3299-0

I. ①墨… II. ①水… III. ①墨家②墨子-注释

IV. ①B2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3152号

墨子

著 者	水渭松
责任编辑	马振奎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社 址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40 1/16
字 数	290千字
印 张	22
版 次	2011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1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299-0 / G·1322
定 价	48.0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墨子	1
一、姓名	1
二、籍贯	5
三、生卒	5
四、出身	7
五、生平	8
第二章 墨家	16
一、墨家产生的时代与社会背景	16
二、墨家的团体组织与活动	18
三、墨家的分裂与学术研究的勃兴	21
四、墨家的衰亡	24
第三章 《墨子》	28
一、篇目	28
二、作品类别、内容、作者与体例	28
三、主要参考书	41
第四章 墨子学说的基本体系与主要思想述评	42
一、墨子学说的基本体系	42
二、主要思想述评	43
第五章 《墨子》文章风格	63

第六章 读法	68
第七章 释词	72
第八章 《墨子》选读	77
修身	77
所染	81
法仪	87
七患	91
辞过	98
三辩	105
尚贤上	108
尚贤中（节选）	112
尚贤下（节选）	119
尚同上	119
尚同中（节选）	124
尚同下（节选）	129
兼爱上	129
兼爱中（节选）	133
兼爱下（节选）	138
非攻上	143
非攻中（节选）	145
非攻下（节选）	149
节用上	155
节用中	159
节葬下	163
天志上	179
天志中（节选）	185

天志下（节选）	189
明鬼下	190
非乐上	209
非命上	217
非命下（节选）	225
非儒下	228
经上 经说上（节选）	244
经下 经说下（节选）	257
大取（节选）	268
小取	275
耕柱（节选）	282
贵义（节选）	290
公孟（节选）	296
鲁问（节选）	307
公输	320
备梯	324
旗帜	329
主要参考书目	335
跋	338

第一章 墨子^①

一、姓名

在我国先秦诸子中，有一位将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社会民生的人，他就是墨子。墨子，姓墨氏，名翟，这姓名本无问题，但后来竟逐渐生出疑问来，弄得这位墨子到底姓甚名谁，也成了一宗疑案。故此，得先为他“正名”，并将有关情况作一简述。

疑案的发端，可以追溯到南齐孔稚圭的那篇《北山移文》，文中有“泪翟子之悲，恸朱公之哭”二句。称墨子为“翟子”，称杨朱为“朱公”，这种称法，世所仅见。那么，作者为什么要这样称呼呢？日本汉学家渡边卓认为，这或许是出于修辞上的考虑而标新立异^②。这看法是正确的。除此而外，作者并无表示墨子姓“翟”，杨朱姓“朱”的意思。然而，继此而出现的旧说出于元人伊世珍的《琅嬛记》却径说墨子姓“翟”。书中引所谓《贾子·说林》之文说：“墨子姓翟名乌，其母梦日中赤乌飞入室中，光辉照耀，目不能正，惊觉生乌，遂名之。”《琅嬛记》记述的都是荒诞离奇的事情，并且所引用的所谓“世莫之传”的书籍，也都是出于伪托，《贾子》也一样。所以《贾子》关于墨子姓翟名乌的说法，原是不足凭据的。可是，自《琅嬛记》之说一出，其后即有附和者，如清代周亮工就信以为真。他在《书影》中就说：墨子“以墨为道。今以姓为名，以墨为姓”。清末的江琬在他的《读子卮言》中，专门有一篇《墨子非姓墨》的考辨文章，文中列出八条理由，极力推证其说。这里仅举出其中最主

要的一条，来看看它能否成立。他说：周秦学派“所谓九家者，墨家而外，若儒、若道、若名、若法、若阴阳、若纵横、若杂、若农，莫不各举其学术之宗旨以名其家……若墨为姓，是以姓称其学，何以独异于诸家乎？此不合于九家名称之例”。即按照通例，“墨”只能是标举墨家宗旨之名，而不可能是墨子之姓。于是，他进一步对“墨”字的含意与“墨家”名称的由来作了论述。他说：“所谓‘墨’者，盖垢面囚首、面首黧黑之义也。墨子之学出于夏禹^③，禹之为人俭苦之极规，故墨氏亦学之。墨子之学深合于‘墨’字之义，故以‘墨’名其家。”至于为什么有“墨子”之称，他说：“墨子著书，以墨道闻”，“世乃以其学称其人，故曰‘墨子’。”这样的推论，很明显是想当然的。这里所牵涉到的，已不仅是墨子是不是姓墨的问题，还有与此相关的为什么墨家要以“墨”名家的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是无可回避要作出解释的。

对于墨子是否姓墨的问题，在此不想做烦琐的考证，只需举出孟子所说的一段话，即可得到澄清。孟子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这里，不但“杨朱”、“墨翟”相并列，而且将“墨氏”与“杨氏”并提。孟子的生活年代与墨子十分接近，他虽然未及见到墨子，但是当他说这话时，墨家的势力方兴未艾，乃至为天下舆论所向，是为他所深恶痛绝的。因此，他是绝不可能连墨子的真实姓名都会弄错的。他的直称“墨氏”，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他是确认“墨氏”无异于“杨氏”，墨子是以“墨”为姓氏的，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至于墨子是名“乌”还是名“翟”的问题，实在是很清楚的，因为明摆着《墨子》书中记述墨子自称其名的许多例子，足以说明。

例如他说：“翟闻之”（《贵义》），“此翟之所谓忠臣者”（《鲁问》），等等，却无一自称为“乌”的。这与孔子的自称为“丘”一样，是古人自称的通例。从这里，我们同时也可以明了“翟”不可能是墨子的姓氏，因为古人没有单以姓氏自称的习惯。

肯定了墨子的姓名之后，我们才能探讨墨家为什么要以“墨”名家的问题。周秦诸子九家名称的由来及其产生的时间，这是学术界尚在研究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是无疑的，即各家名称的由来并不一致，它们产生的时间也不会是划一的。既然如此，那么对于它们名称的含意，也必须因家而别地去理解，而不能一概以“举其学术之宗旨”为模式去强为曲解。以墨家而论，自江瑛开了从“墨”字字义去寻求名家本意的先例之后，有人即对江说作补充说明，认为含有“刑徒役夫”之意^④。也有人另觅新解，以《庄子·天下》所说墨子“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荀子·礼论》所说“刻死而附生谓之墨”，《荀子·乐论》所说“其送死瘠墨”为例去作解释^⑤。有人从工匠使用的“绳墨”去解释，认为墨家是守御集团，因此必与构筑城郭、制作守卫兵器的工具有关^⑥。如此等等，游移难定。这种情况本身也正好说明，没有一种说法是确定不移的具有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的。

我认为，如上所说，既然墨子之姓墨氏已毋庸置疑，那么，它与墨家的以“墨”名家必然有关；而不可能“墨”既为墨子的姓氏，又同时具有另外的含意，两者只不过是偶然的巧合。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有了墨子其人，所以才有“墨”家与“墨”学，这是难以推翻的事实。

那么，墨家为什么要以墨子的姓氏名家呢？我认为可能出于两种因素：第一，这是墨家组织的成员对于首领的崇敬意识的反映。《庄子·天下》说：后世的墨家成员，“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⑦对于当时的首领都崇敬到如此程度，可见这种观念是多么的强烈！我

们由此可以设想，在墨家创家之初，它的成员出于对开创者墨子的崇敬与爱戴，而主张以他的姓氏名家，也正是情理之中的事；第二，这与墨家组织的特殊性质有关。墨家是一个组织严密的集团（详见下），首领即统帅，一切部署行动都得听从于他。这种显要的地位和作用，使得以墨子的姓氏名家有极大的可能性。如果事实确实是这样，那么，墨家名称的产生显然是出于它本身的原因，而不是如江璩等人所说是世人的外加。

【注】

①阅读《墨子》一书，首先要了解墨子其人；其次还要了解有关墨家的情况。这是由于墨子是墨家的创始人，而墨家则是一个团体组织，活跃于整个战国时期。《墨子》一书实际上是墨家著作的汇编。为此，这篇导言先从墨子说到墨家，再说到《墨子》其书。

②渡边卓：《古代中国思想の研究》附编《墨家思想·墨子》。

③关于墨学出于夏禹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一方面见于《墨子》本书，墨子只是把他作为“古圣王”之一，与尧、舜、汤、周文王、周武王一起加以称赞，并未突出他一人，而且这种称赞主要是为了借重。另一方面，在《庄子·天下》中，虽有墨子对夏禹在治水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的赞扬的记述；在《淮南子·要略》中，作者又认为墨家的主张节财、薄葬是取法于夏禹。然而这也只能说明墨子是受到了关于夏禹传说的某种影响，而不能说墨学本源于夏禹。

④钱穆：《墨子》（万有文库本）。

⑤张纯一：《墨子集解》附录《墨称之探本》。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意谓以准绳自厉，而防备世道之危急。刻死而附生，谓削减丧葬之费用而增益于生者。墨，谓贪。瘠墨，谓节俭刻薄。

⑥渡边卓：《古代中国思想の研究》附编《墨家思想·墨子》。

⑦巨子：或作“钜子”，是墨家成员对首领的称呼。墨子在世时是否

已有这种称呼，尚不可知。为之尸：奉他为主帅。

二、籍贯

墨子是鲁国人，这虽然未能作为定论，但也大体不误。最早提出鲁人说的是东汉的高诱，见于他的《吕氏春秋·当染》注，并不知道他根据什么。不过，《当染》中的一条材料，必然是主要的根据。篇文中说：“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原注：史角之后）在于鲁。墨子学焉。”史角由于被鲁惠公所挽留，他的后代就居住在鲁国，为墨子所从学。由此看来，鲁国很有可能是墨子的故国。孙诒让根据《墨子》本书等考察他的居住之国与行动的出发地，也得出“似当以鲁人为是”的结论^①。另外，还有人认为是宋人、楚人，甚至于认为是印度人、阿拉伯人等^②，都是无法成立的。

【注】

①孙诒让：《墨子间诂》后语《墨子传略》。

②晋葛洪主宋人说，清毕沅主楚人说，民国时胡怀琛等主印度人说，金祖同主阿拉伯人说。可参阅方授楚：《墨学源流》。

三、生卒

我们根据现有资料，要确定墨子的生卒年代是不可能的。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对此都已作模棱之词，说：“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此后，刘向说：“在七十子（指孔子学生）之后”（《史记》索隐引《别录》），班固也认为“在孔子后”（《汉书·艺文志》）。刘、班之说是比较正确的。自清代至今，有许多

学者对此进行考证，各有其说。由于对于藉以立论的事例看法不一，因而差距甚大，势难归于一体。在此，也只能求得一个比较合理的近似值。

关于生年，我认为刘向说的“在七十子之后”，孙诒让定于周定王初年（公元前468年左右），是比较恰当的。我们姑且不去纠缠于有关事例的甄别考证，而从墨家学说的酝酿、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这一角度作一考察，或许能得到印证。首先，我认为及至《论语》的编纂成书，墨家及其学说尚无迹象，当处于酝酿阶段。《论语》主要是记述孔子言行的，但孔子弟子如子夏、子张、子游、曾参等人的言行也有少数入选，记事迄于曾子之死。我们看这些弟子的言论，其内容丝毫没有涉及墨子及墨家学说的。这情况说明什么呢？是不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呢？不是的。因为墨子学说是对于儒家学说的反思和批判（详下），所以，这是关系到儒家学派命运的非同小可之事，即使儒家君子们雍容大度，也不至于无动于衷、缄口不言。这只能说明，墨家学说当时还正在酝酿，尚未产生社会影响。到了子夏、曾参的弟子一辈，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见于《墨子》书中子夏之徒与公孟子（公孟子：即公明仪，曾参弟子）对于墨子有不少责难之词（见《耕柱》、《公孟》），这说明此时墨子已卓然成家，与儒家也已壁垒分明，且有一争雄长之势。之后，到孟子之时，他竟有失风雅地叱之以“禽兽”，并以“拒杨墨”为己任，两者已发展到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地步。这说明此时墨家学说已有较深的社会影响，并成为儒家学说的严重威胁。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过程。由此可以推测，墨子的生年大致与孔子的再传弟子相当。

再从另一个方面看，《淮南子·要略》说墨子本是“学儒者之业”的，由于对儒家学说的不满而另创墨学。由从学到不满而厌弃，从酝酿到创立墨学和墨家学派，以至于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这绝不

是一个短暂的过程。故假设墨子也“十有五而志于学”，二十余岁孕育墨学，至“而立”之年始创立墨学和墨家学派，而此时正值曾子之卒年（公元前436年），则墨子的生年当是公元前466年。

关于卒年，吴毓江《墨子校注》之“附录”有一条考订材料，很可参考。他说：“据《吕氏春秋·上德篇》，吴起死时（原注：楚悼王二十一年。案：即公元前381年），墨者巨子为孟胜，孟胜死，属巨子于宋之田襄子。考之《墨子》本书，无孟胜、田襄子其人。若其时墨子新卒，二巨子之名似不应皆不见于《墨子》书。在理想上，墨子之后设已有巨子制，其巨子当属诸禽滑釐（原注：《耕柱篇》有“子禽子”之称；《吕氏春秋》的《当染》、《尊师》两篇载许犯、索卢参为禽子弟子，皆可为禽子死于墨子之后，尝讲学授徒之证）。今非禽子者，可推知吴起死时，墨家巨子之传已非一代，即禽子亦已不在人间也。”渡边卓进而估计墨子之后禽滑釐继为巨子为二十年，从而断定墨子活动的下限为公元前400年^①。我想，墨子是否在临终前夕才将统帅之职位传给禽滑釐，已不得而知，即使不是，也当不久人世是不会错的。从禽滑釐为巨子，到孟胜为巨子，直到他在吴起死后自杀为止，估计为二十年上下，虽较粗略，而大致不会有大的出入。这样，可以把墨子卒年定在公元前400年左右，他的一生活了六十多岁。以其劳苦不堪，比之于说他活了八九十岁，这似乎较近于实际。

【注】

①渡边卓：《古代中国思想の研究》附编《墨家思想·墨子》。

四、出身

墨子出身于平民^①。当时有人说他是“贱人”，“贱人”就是平

民，他自己也表示认可（见《贵义》），说明这是合乎实际的。但是，墨子虽为平民，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他还能就学。就学是步入仕途的一条通途，所谓“学而优则仕”，墨子也有可能由此出仕。这说明他与平民中那些生活贫苦，处于最下层的人还是有区别的。

【注】

①顾炎武：《原姓篇》说：“庶人无氏，不称氏称名。”墨子有氏，说明他祖上并非庶人。这也与他能就学的情况相应。

五、生平

墨子的一生是极不平凡的，遗憾的是，对于他的生平事迹，我们能了解的是太少了，除了《墨子》本书有一些记载之外，其他有关书籍都只一鳞半爪，且往往语焉不详。就已经知道的事情来说，也不能确指其时日，因此，很难理出一条其生平行事的线索来。在《史记》中，司马迁仅以不肯定的语气写下二十四字，附记于《孟子荀卿列传》之末尾：“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司马迁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史学家，为什么对于这位勤生薄死，不惜牺牲自己以急百姓之难的墨子，如此冷漠呢？有人以司马迁未见《墨子》一书作解释^①。这是有悖于事实的。因为他父亲司马谈作《论六家要指》，对于墨家的得失作过比较公允的评述，说明司马谈对《墨子》一书曾作过深入的研究。既然如此，继承父职作太史令的司马迁当然是不会不见到《墨子》的。更何况他在《自序》中说明作此《孟子荀卿列传》的缘起时，也明说“猎儒墨之遗文”。所以，司马迁为何如此写，是一个尚待解开的谜。

我认为，为我们揭开墨子生平第一页的，是《淮南子·要略》中

的下面一节文字：

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②，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淮南子》作者的本意，是在说明学术的因革演变^③，使我们知道墨家学说是脱胎于儒家学说，是扬弃其弊病的产物。但我们却从中窥察到墨子早年经历的一点痕迹：他曾经是儒门的一个弟子，可他不是一个唯儒师之言是听的谨守家法的弟子，而是一个对于所学习的儒家学说敢于从社会价值观出发进行反思，看出它的弊害，从而自己果断地开辟新路的人。墨子对于儒学的不满，根据上文来看，是三个方面：一是“其礼烦扰而不悦”。烦扰的意思是繁杂。“悦”，据王念孙说当为“悦”（tuò），是简易的意思^④。礼，并不是说儒家本身的礼，而是指周礼。因为儒家是很拥护周礼的，他们把维护周礼看作是自己的使命，并且把它纳入教学的必修课程，不仅要明确它的意义，了解它的内容，而且还要熟悉怎样行礼。儒门弟子正因为有这方面的修养，所以能充当司仪官。

周礼，从本质上说，无非是起着巩固周朝等级秩序的作用。自西周降于东周，随着周朝的由盛转衰，周礼也不可避免地日趋崩坏。孔子是十分向往西周礼隆乐盛的局面的，他希望能回复到那种境界。周礼所包含的主要礼仪的种类，即有婚礼、丧礼、冠礼、祭礼、射礼、燕饮礼、朝聘礼等。人们日常的饮食起居，人事交往，无不有一定的礼节，真可谓无礼寸步难行了。并且，每一种礼仪形式，从始至终，更有十分复杂的升降揖让、趋翔回旋、献受酬酢等动作，相应的，在神色表情上还须刻意做作，活像表演节目一样。其要求之严格，乃至不许有丝毫的差错。墨子对此十分反感，是无可非议的。

再一是以为“厚葬靡财而贫民”；第三是以为“久服伤生而害事”。这两条说的是丧葬之事。丧礼葬礼是周礼的一个门类，在儒家也是很看重的。其仪节规定的烦琐固不必说，墨子尤其关注的，是这种丧葬之礼带给社会民生的严重危害。“厚葬靡财而贫民”，是说厚重的葬礼要糟蹋掉大量的财物，造成了人民的贫困。“久服”意思是长时间地居丧，“伤生”即伤害生命，“害事”即危害工作和生产。注重孝道人伦的儒家是提倡这种做法的。这里，显示出年轻的墨子已能从对于社会民生是有利还是有害这样的功利主义高度，揭示并批判此种礼仪制度的陈腐性和危害性。以上三个方面，反映了墨子对于为儒家所崇尚的周礼的主要不满之处。墨家学说的一些重要方面，正由此孕育萌芽。“故背周道而用夏政”，表示了他对于周礼总体上的背弃。周道，在这里是指周朝的处事原则和方法，具体是指上述的繁礼、厚葬、久丧。夏政，在这里是指夏禹处事一切从简的原则和方法。墨子上距传说中的夏禹时代，约有两三千年，当时既无文字记载可作为依据，所以“夏政”究竟如何，墨子当然也无从知道，只是根据传说而有所取舍，借此作为论证已说的资助罢了。

对于现行礼仪制度的不满，必然想反其道而行之：因繁褥而求简易，因文胜而求尚质，这对于一切以社会民生为重的墨子来说，是必然的趋向。

不仅如此，青年时期的墨子就已处处表现出他是一个救世心切的人。他抱定决心，要把眼前这个人们已被利己之心所驱使，而不惜互相敌视、互相损害、互相残杀，致使生灵涂炭的社会，改造成为充满爱的安宁富庶的世界。正是从这种强烈的愿望出发，他构筑起自己的救世学说——以“兼爱”为中心的学术思想体系。学术思想体系的建立和著作的草创，约在三十岁前后。虽然，他对于自己的学说自信甚坚，可是，在如此离乱之世，要施展自己的抱负，实现宏愿，真无异

于移山填海。更何况他身处于儒家势力集中、影响又大的鲁国，举步维艰是可想而知的。然而他并不因此而退缩，而是踌躇满志地开始了他的极不平常的事业。他一方面对世人作解说开导，希望自己的主张能为人们普遍地接受；另一方面，则开始收徒讲学，以造就人才，加强创业的力量。

墨子的收授弟子，其详情不可得知，然而有一事却很可注意，即在他早期的弟子中，有一个以后成为他的得力助手的禽滑釐。禽滑釐比墨子年少，但所差无多。他与墨子恰有一类似的经历，即也是儒门弟子。《史记·儒林列传》记载，他与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等人，都“受业于子夏之伦”，即从学于孔子的弟子一辈。但是所不同的是，其他三人都先后“为王者师”，唯独禽滑釐转学于墨子^⑤，这中间的原因是发人深思的。他很可能与墨子早先的经历一样，对于所学的儒业已心存反感，因而别谋他途。所不同的是，此时墨子已树立旗号，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因而他毅然改弦易辙，投身于墨子门下。我们透过这一事例，可以窥见墨子初期事业成功之一斑。

随着学术地位的渐次确立，影响日益扩大，墨子开始了以诸侯国“王公大人”们为对象的游说活动。与此同时，他还派遣他的弟子去一些诸侯国任事。

他的足迹曾达到过北邻之齐，也曾南游至卫、楚等国。在齐，他劝说齐将项子牛不可伐鲁，不然会自取其祸（《鲁问》）；在卫，他又规劝卫大夫公良桓子要清醒地看到卫处于齐晋两个大国之间，假如一味贪图淫逸生活而不重视蓄养军士，则难免速亡的命运（《贵义》）；至楚国，他则将自己所著之书献给楚惠王（同上）。此书虽然为惠王所称许^⑥，惠王却以自己年老相推辞，不予接见（案：楚惠王死于公元前432年，当时墨子约三十七岁，献书给楚惠王当在这之前）。此时，惠王臣子鲁阳文君对惠王说：“墨子，北方贤圣人，君王不见，